

笔者的基本看法是,一种更高水准的绿色话语研究,可以使包括高校和民间智库等在内的学术研究机构与学者个体成为一个更为积极的环境政治主体,从而更有效地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一个需要补充说明的问题是,我们应如何理解哲学价值伦理取向或意识形态与绿色话语建构之间的关系。换言之,为什么我们需要那些“政策变现”能力不强的那些激进版本的绿色话语?比如,可持续发展话语的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初就有“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之分,而柏林自由大学环境政策中心(FFU)最先提出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就大致属于一种“弱可持续发展理论”;类似地,北京大学最近组建的“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研究小组”就是希望在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话语研究及其实践中引入一个“红绿”或“绿色左翼”的政治维度。本人对此的阐释主要是受到英国学者安德鲁·多布森(Andrew Dobson)的启发。^①他在论证激进的生态主义的研究与宣传的作用时指出,激进的意识形态或政治哲学的首要作用,是为现代民主社会确立一种政治思考与选择的最大空间或极限参照。也就是说,现代民主社会在现实中恐怕都不会严格实现任何一个最为激进的政治想象,但如果没有这些激进的政治想象的话,现实政治将会是缺乏任何方向的。大致在上述意义上,笔者认为,就像“强可持续发展”话语的研究与传播具有其内在的必要性一样,“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话语的进一步探讨可以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做出独特的贡献。

可持续发展目标实现中的中国角色与挑战

贝特霍尔德·库恩

(联邦德国柏林自由大学 奥托苏尔政治学研究所教授、国际合作政策顾问)

在2015年9月25日举行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上,世界各国领导人接受了面向2030年的包含17个具体任务的“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着力于消除贫穷、与不平等和非正义作斗争和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这些目标是在“同一个世界”的精神下达成的,涵盖了与各个国家相关联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追求。与“千年发展目标”不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相关活动不仅关涉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而且需要所有国家做出相应的调整。

可持续发展概念涵盖并与当今中国等许多国家已在使用的其它概念术语相互交叉,比如绿色发展、生态文明、生态马克思主义、低碳经济和循环经济。学术研究与争论有助于深化和拓展各种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政策话语。目前,许多国家高校已启动了多种形式的伙伴关系与项目来推进对此的跨学科理解,比如由加拿大、中国、德国、以色列和俄罗斯的五所大学组织的“可持续大学联盟”(UAS)项目。

过去几十年中,致力于环境与气候保护议题的组织、机构和研究项目成倍增长。新的智库、基金会和其它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社会传媒则推进了绿色知识的交流与传播。从政治学的视角看,面向绿色议题的机构与专家的大量增加,为参与性和合作性的新治理形式提供了机遇。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合作治理在中国的出现,是政府适应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变化与挑战的新方式”。^②

中国在推进2030年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这包括在2015年12月巴黎峰会前后的各种外交努力。尽管一些国家多年来指责美国和中国在联合国气候谈判中缺乏诚意,但正是这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在2014年11月奥巴马访华时联合宣布了各自国家对于削减其碳足迹的政治承诺。中国已经表明了,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方面的很大程度上的灵活性,并决心消除其“国际谈判中

^① 参见安德鲁·多布森《绿色政治思想》,山东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② Yijia Jing, 'Introduction', in Yijia Jing (ed.): *The Road to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hina*, New York: Palgrave 2005, pp. 1–22.

的强硬派”的形象。^①比如,习近平主席亲自出席了2015年9月举行的《2030 议程》纽约峰会和2015年12月举行的巴黎气候大会。

下面笔者将阐释为什么说中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并将讨论中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会遇到的不同层面上的主要挑战。本文的撰写,基于笔者对相关政策文件的分析和2016年春在北京大学做短期访问期间对有关专家与活动分子的访谈,该访学活动得到了柏林自由大学和“可持续大学联盟”的项目资助。

一、中国在推进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长期的全球环境政治参与 中国对国际环境政治的参与,可以追溯到1972年的联合国峰会。在重获联合国安理会合法席位之后,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确立其在联合国框架中领导性角色的机会。中国是最早批准1992年里约峰会相关公约的国家之一。《中国21世纪议程》或《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和发展白皮书》(1994),使可持续发展概念得到了广泛传播。目前,中国已经制定了一系列环境法、资源管理法、行政规章和上千个环境标准,同时还制定了更多的相关性教育、健康、文化和社会保障法律。

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的模范 中国在实现“千年发展目标”上的成功这一事实,是她得以继续支持“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一个重要促进因素。可持续发展目标致力于削减贫困,并与中国新世纪之初的国家优先发展目标相一致。同时,中国的杰出表现也提高了其在联合国的声誉和地位。

南南对话与合作的积极推动者 南南对话与合作对于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达成是至关重要的。中国长期以来就在南南合作中扮演着一个领导性角色,尤其是在77国集团的框架下。最近,中国已经成为“金砖”国家集团的领袖,并借助于“中非合作论坛”(FOCAC)等机制大大扩展了与非洲国家的合作。尽管中国对某些发展中国家对于千年发展目标整合到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保留态度表示了敏感,但也通过显示其在艰难的全球谈判中的灵活性而强化了发展中国家对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支持。中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她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巨大份额,使其成为《京都议定书》失效后达成一个新协议的外交谈判努力中的焦点。尽管中国在《京都议定书》框架中被列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并因此受益于清洁生产机制(CDM),但如今她已被普遍认为应该在国际协议达成与落实中承担更大责任,尤其是在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方面。在最初的对于将治理、和平、安全和人权等议题纳入其中持保留意见之后,中国最终同意把治理、和平和人权列为可持续发展的第16个具体目标的关注点,并鼓励其它国家也同意把更多的敏感议题包括进来。中国不断增加的国际投资,包括在那些贫穷和政治不稳定的国家,也有助于强化她对善治、和平与安全议题的关切。

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后出现的重大转折 在国际层面上,哥本哈根大会是国际气候保护外交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中国被认为是一个“强硬派”,西欧国家和一些脆弱国家表达了它们对于国际社会未能达成一个约束性协议的失望和不满。但是,哥本哈根大会也引发了中国气候外交政策的一个反思与重新定向过程。日趋恶化的污染难题、国内外媒体对于中国主要城市PM_{2.5}水平居高不下的大量报道,唤醒了各个层面民众的意识。就像“千年发展目标”一样,新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契合了当今中国的全国性发展议程。自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以来,中国的政治领导层已经逐渐把更多的绿色发展目标与指标引入到全国发展计划之中。把绿色的可持续发展目标纳入其中,与中国当前的环境保护和与污染和气候变化作斗争主题是一致的。

二、中国在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将遇到的挑战

新常态的挑战 中国的“新常态”意味着较慢但更绿色的增长。革新是“十三五规划”的核心理念,而绿色发展将在其中扮演着一个比以往更为突出的角色。胡鞍钢教授在比较各个五年计划后认为,中

^① Haibin Zhang: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climate change negotiations*, WeltTrends Online Dossier 12, March 2013.

国明显在经历一个从黑色发展向绿色发展战略的转移。^①

中国已经下调了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更多地集中于有质量的增长。这种重心的转移要求经济结构的重建和生产与消费类型的改变,尤其是在能源生产与消费领域。

在2016年3月举行的低碳发展蓝皮书发布会上,齐晔教授估算,中国的碳消费总量很可能在2013年就已达到顶点。服务业自2012年起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部门。他还强调了消费类型正在发生的变化。他基于编制年度性低碳发展评估报告的研究表明,转向消费很可能是中国走向低碳发展的最有效方法。^②

环境雄心与社会福利之间的交换 可持续发展目标语境下中国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同时应对节能减排要求和对于经济重建背景下大量能源产业工人失业威胁的不断增加的关切。如,来自煤矿的大众性抗议在过去几年中迅速增加了。

欧洲国家在经济重建过程中曾经历了长期的工人罢工浪潮,尤其是1980年代后期的英国。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可能是抽象的,并时常因为其含义模糊而遭受诟病。然而,它的多向度视角或许可以提供某些帮助,以便平衡对经济重建政策与环境和社会关切的考量。

地方层面上的落实 尽管中国倾向于采取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议程设置,但她也给各种形式的地方探索预留了巨大空间。地方层面上的经验,比如低碳城市、低碳社区试点和省市层面上的排放交易平台建设,或许可以提供推进可持续发展领域决策的有益思考。然而,环保与社会福利领域的大量新法律和规章的落实,亟需基层层面上的大规模能力建设与培训,以便在次国家层面上创造出必要的结构、刺激和意识。

走向社会与生态概念和运动的融合 可持续发展承认将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必要性。随着生态向度的引入,这一概念增加了一种新的政策认知倾向,即或者仅仅强调经济增长,或者仅仅强调社会平等。

交叉性的可持续发展概念具有连结不同理论和政策领域的潜能,以便促进不同层面上的合作治理。当代精英与国际外交机构之所以赞成这一概念,是因为它着眼于那些能够扩大不同政策共同体与利益相关者的共同理解的观点。如今,试图确定环境新社会运动(“绿色运动”)和传统的劳工运动(“红色运动”)之间联系的努力,也已经进入了中国学者的视野。^③ 探讨可持续发展议题话语的多样化,也许是中国和其它国家落实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肥沃土壤。围绕着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工作构成了使可持续概念在各个国家中落地生根的重要载体。当然,由于其本身的复杂性,可持续发展目标话语将会更多是补充而不是取代中国和其它国家中的本地性话语。

可持续发展与发展替代语境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李全喜

(北京邮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

任何一种范式革新意义上的话语都会构成一种统摄性的“话语语境”(discursive context),从而对更具体性的相关学术理念或话语的学理阐释和实践应用产生一种背景性或总体性影响。可以说,“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与“发展替代”(alternative to development)就是这样两种颇为不同的范

① 参见胡鞍钢《中国:创新绿色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参见齐晔《低碳发展蓝皮书:中国低碳发展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

③ Qinzhi Huan “Development of the red-green environmental movement in China”,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25/3(2014) pp. 45-60.